

# 从第一次武装移民透视 日本“满洲移民”本质

秦玉霞, 孙瑜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加速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系统化移民。从第一次武装移民的实施过程来看, 该团体既是以村屯为载体的政治殖民组织; 又是以缓解人口危机为桥梁的经济组织; 同时也是以“移民”身份为掩护的关东军后备组织, 所暴露出的是日本殖民手段的多重性, 其中既有政治同化、经济掠夺, 还伴随军事欺压。“满洲移民”相较其他破坏和平、掠夺资源、侵占利权等方式, 更显复杂性和多元性, 但无论何种手段, 都是服务于永久占领中国东北这一终极目标。

[关键词] 日本; 武装移民; “弥荣村”; 殖民侵略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2024)04-0143-08

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势力手段有两端, 一为军事占领; 二为人口增殖。长期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更是深谙其道。就人口增殖——海外移民而论, 早在日俄战争后, 日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便积极经营谋划向中国东北移民。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曾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组织了几次试验移民, 但因规模小、资金短缺, 加之移民东北计划尚未在日本国内达成公决, 最终告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伪满洲国建立后, 日本殖民者审时相机, 策划了武装移民计划, 自1932年始, 陆续向“北满”地区发动了五次武装移民。

其中第一次武装移民<sup>①</sup>作为以伪满洲国为依托发动的首次移民活动, 在日本“满洲移民”计划中具有特殊意义。首先, 此次移民是在总结了前期

试验移民失败基础上出台的, 体现了日本“满洲移民”的战略调整; 其次, 它为后期移民计划提供了经验和方向。第一次武装移民在实行期间常有日本官员、学生团体视察参观, 留下了大量的视察报告, 以及详细记录移民团生产生活的资料和图片,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此次移民的重要性。关于“满洲移民”殖民本质的研究, 学术界已有相当成果<sup>②</sup>问世, 但借助具体移民团实例, 剖析“满洲移民”本质的成果尚不多见, 且现有对第一次武装移民的专论性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概况性介绍。本文试图以此次移民为例, 从移民团在殖民地的具体实态入手, 揭露日本“满洲移民”政策的本质。

## 一、基层政治殖民组织

日本发动“满洲移民”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永

[收稿日期] 2024-04-23

[基金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创新项目“‘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研究(1931—1945)”(HSDSSCX2019-48)

[作者简介] 秦玉霞,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日关系史; 孙瑜,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日关系史。

① 1932年, 日本组织493人的移民团前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永丰镇, 并将此地命名为“弥荣村”, 因此次移民为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占领东北后的首次移民, 加之移民团成员均为退役军人, 军事色彩较重, 因此称之为“第一次武装移民”。但部分日文史料为弱化此次移民的军事侵略色彩, 称其为“第一次移民”“第一次弥荣村”或“第一次满洲农业移民”。

②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孙炜:《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满洲农业移民”动机探析》,《理论学刊》2021年第4期。徐茂宇、李勇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舆论因应》,《古今农业》2021年第4期。耿雪:《日本“开拓团”应译为“殖民扩张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28日第002版。王胜今、高瑛:《以“开拓”为名的日本移民侵略——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分析》,《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2期。沈海涛、衣保中:《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郑毅:《帝国意识支配下的东亚人口移动问题研究——以日本“满洲移民”政策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久独占中国东北。在政治从属权方面，永久定居需“最终彻底改变移入地的人口结构，民族结构，社会结构，并影响其社会走势，确保永久定居持续性。”<sup>[1](P32)</sup>日本殖民者深谙此道，移民东北的企图之一便是依靠本国民众在他国殖民地小范围构建独立日本农村，继而为中心向外辐射，最终形成大面积占领区，而第一次武装移民的首要任务便是构建以移居地为核心的村屯组织。此外，永久居住还需满足“群体性”条件，即大量日本民众自发移居“满洲”。为此，日本殖民者在国内大力宣扬利用在“满”移民“建设优秀日本民族参加指导的真正王道乐土。”<sup>[2](P1)</sup>煽动国内民众投身“满洲移民”事业之中。

### （一）构建独立日本农村

构建独立日本农村是日本殖民者策划“满洲移民”的主要形式。此举一则可以高度团结日本移民，方便共同行动；二则可以深入东北内地，同化当地民众。

第一次武装移民从提出至实施，经过了日本军、政各界反复讨论、筹谋，以至移民团在到达预定地后，便能旋即开展各项事务，一改前期试点移民零散分布的特点，构筑起符合战争所需的村落组织。

第一，名称上。为掩饰作为“移民团”“屯垦队”的侵略性质，殖民者将入侵地——永丰镇改名为“弥荣村”，“弥荣”一词来自日本神道教，取“繁荣昌盛”之意。日本殖民者通过赋予移民村“日本化”的名称，试图在保持自身民族特征的同时，对当地民众进行“去中国化”的宣传，达到在思想上同化中国民众的目的，这也是日本“满洲移民”计划背后的险恶用心。

第二，人员组织上。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入殖“弥荣村”后，并未着手扩大规模，而是先以团体形式协同工作，通过一年生产经营后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组织体系，并逐步招募家属入殖。初期所招募成员仅限于30岁以下有农业经验、受过教育的男性退役军人，要求身体健康、品行端正、思想坚定、能吃苦耐劳。<sup>[3]</sup>对所募人员的明确限制坦露出该移民团绝非普通农业移民。后期由于移民成员无法忍受“开拓地”的种种困难，相继出现退团现象。为安抚移民情绪，“改善团员不安定的状态，同时进一步补充劳动力，根据东宫铁男提案，开始招募花嫁<sup>①</sup>。”<sup>[4](P6)</sup>由此将妇女纳入计划之中。

第三，村政建设上。设立了中枢机构——村公所，公所下设部落，成员按照出生地被划分为13个部落，部落名称采用移民成员出生地的日本地名，如青森、岩手、秋田、山形、福岛等地。此举

同样带有明显复刻日本农村的意图，不啻为日本农村的延长。公所内设村长一名，统筹移民事项，另外配备会计师、宪警、土木建筑师、学校勤杂工，以及产业、邮政、户籍、卫生、教育等行业主管等维护“弥荣村”正常运转。此外，移民团还定期召开村会、区会，商讨相关事宜。

为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移民团负责人另外设置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机构。具体包括：

“弥荣村共济会”，为遭遇困难的移民提供借款，该会会员需定期缴纳钱款作为保金。进德会，旨在加强移民成员“开拓”信念，通过精神控制增强内部凝聚力。除进德会外，为进一步约束成员，移民干部还颁布了防止团员退团的《屯垦队惩罚令》。退役军人分会，以“以锻炼军人精神，提升军事能力为目的”而创设。<sup>[5]</sup>爱林会，借“保护森林”之名，禁止中国民众采伐木材的同时，为日本移民窃取森林资源行方便之举。土地委员会，负责土地分配、开垦及改良等业务。协和会，为贯彻“为达收揽满洲原住民之人心、道义、民族的结合境地……以日本国民大量移住，充当和原住民实现民族结合之媒介”<sup>[6](P38)</sup>理念而设，以此宣传标榜“五族共和”的协和会精神，达成用“日本民族三千年来培养的大和魂同化其他民族”<sup>[7](P3)</sup>的目的。

第四，生活设施上。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政治管理层面的尝试，尚不能完全构筑起符合日本殖民者预期的“移民村”整体概念，为完整建立“日本移民村落”，移民团进行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其中首要工作便是完善住所，在移民团入殖伊始，便低价从当地民众手里收买了两所粮栈，改造成简易宿舍，同时强令当地99户居民约400人迁出移民地，为聊表安慰，每人仅发给5元搬家费，如此便将当地居民房屋悉数划为己有。之后，为建立起符合日本人生活习惯的村落，移民团建置了具有东北特色（为抵御东北严寒，保留了土炕）的日式住房；为方便移民生活，修建了医院、学校等设施；铺设了方便与外界联络的交通、通信网；甚至连文化设施也有所兼顾，创办了向日本国内民众宣传“开拓”精神的《北辰》杂志等。

从种种举措来看，第一次武装移民团能够在短时间内构建起一应俱全的村落组织，无疑是长期谋划的结果。所谓“满洲移民”实则是以永久占领东北为目的的侵略移民，其最终落脚于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新兴社会”，利用日本人口同化瓦解

<sup>①</sup> 大陆花嫁指从日本国内招募的女性，其中包括移民团员妻子和单身女性。

当地中国民众。

## （二）粉饰装点下的欺骗与同化

“满洲移民”是一场由日本陆军省、关东军及拓务省联合导演，诱骗、引导日本国内民众参与配合的殖民计划。为使日本民众积极移民，计划筹谋者一度在日本国内大肆宣传移民东北的“美好愿景”，将入侵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吹嘘成“解放者”的角色，将殖民地傀儡国美化为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理想国”<sup>[8](P131)</sup>。

据参与者松田千卫回忆，“日本政府在国内展开大力宣传，……中国地大物博，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有活干、有地种，生活幸福。凡迁移到中国去的居民都可分得一份足够的土地、房屋和车马农具，凡随家迁移到中国去的男青年都可以免除当兵上前线的义务。”<sup>[9](P32-33)</sup>同时，日本殖民者还利用广播、报刊、文学书籍大力宣传“满洲”为富饶宝库，耕地广阔，土壤肥沃至可不用肥料便可培育出优良作物，电影院还组织专门的“农村演剧队”，不断放映反映“满洲”经济繁荣、工业发达、家畜遍地、生活幸福的影片。此外，日本文学界还掀起了“大陆开拓文学”风潮，文学家秉持“文学之理想即为政治之理想”的理念，创作了大量反映移民团在“满洲”移住地及义勇军训练所的作品。其中，日本文学家佐佐木能理男所作《武装移民团》<sup>①</sup>，汤浅克卫所作《先驱移民》<sup>②</sup>分别以第一、二次武装移民为主题，向日本民众宣传武装移民的“理想信念”。

除向国民宣扬移居地“资源富庶、生活幸福”外，日本殖民者还试图通过“精神绑架”方式，赋予移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忠于“开拓事业”。

首先，被遴选的移民成员要在国内接受不同内容的培训，其中便包括“开拓信念”的培养。其次，从日本出发至“弥荣村”的每一站都要接受训话。例如，1932年10月3日，移民团在东京聆听了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的训词：“……满洲农业移民之重要性勿需多言，立于我国大陆发展之第一线，诸君作为满洲国开发之先驱，使命极为重大，持剑前进，秉锹而立，其精神别无选择之所。”<sup>[10](P55)</sup>同年10月10日，移民团于“奉天”接受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训示：“此次移民为满洲国的帝国政府事业之嚆矢，其成功与否，不仅关乎诸君一身一家，实则左右大和民族之发展及日满协和之将来，诸君责任重大。”<sup>[10](P55)</sup>最后，移民团到达“弥荣村”后，着手利用神道教力量，以神社形式，在殖民土地上布教实践。其中，“弥荣神社”作为日本在东北建立的首座“开拓神

社”，充当了承载移民“开拓信念”的现实载体。神社建成后，每遇日本传统祭祀日，移民团员便在此举行祭拜仪式，试图借助神道教力量，使远在“异国他乡”的日本移民获得归属感，在精神信念加持下，使其按照既定“开拓意志”完成殖民事业。除对日本移民的精神控制外，殖民者同样试图通过借助神社力量，大肆宣扬“日满协和”，同化当地中国民众，摧残、驱逐中国文化，消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最终达到文化统制的目的。

据曾帮助日本拓务省谋划武装移民工作的平井丰一供述：“关于武装移民，日本政府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解决日本农村人口问题和日满协和。”<sup>[11](P635)</sup>可见所谓“实现日满协和”的口号，只不过是殖民者企图蒙蔽国际舆论谴责、弱化中国民众反抗意志、招募日本移民的障眼法。在欺骗性宣传下，第一次武装移民计划也在一定程度受挫，出现了不可控性。

一方面，大多数移民是在国内耕地不足，难以维持生计的情况下，被政策倡导者承诺的“能无偿地得到肥沃土地”吸引至“满洲”的，但移居地实际状态却与宣传大相径庭。东北严寒的气候以及因水土问题而产生的大量患病情况，致使移民团内部发生了大规模“排斥干部运动”<sup>③</sup>，更有甚者造成“屯垦病”<sup>④</sup>蔓延，加之经常受当地抗日武装袭击，伤亡时有发生。种种因素最终使不少移民退团回国，入殖第一年（1932）共有移民493人，退团17人，<sup>[12](P19-20)</sup>至1935年退团人数激增至187人。<sup>[13](P113)</sup>移民退团这一现象便已说明，日本殖民者所描绘的“美好图景”与移民团成员的期望存在一定落差。

另一方面，由于以“战胜者”自居的日本移民所特有的“民族优越感”，以及由这份“民族优越感”所带来的惰性心理，使得移民并不亲从从事农业耕作，而是将大部分土地出租给当地民众为其耕作。据统计，在第一次武装移民团所占的2784.3町步<sup>⑤</sup>土地中，出租土地高达1839.7町

① 佐々木能理男：『武装移民团』、『シナリオ研究』第6号。该篇文章为日本国内第一篇以弥荣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但书中所述并非作者亲历亲闻，而是根据当时日本国内相关“满洲移民”进行的二度创作。

② 湯浅克衛：『先驱移民』、『改造』第20ノ12号。与佐佐木能理男的文章不同，该篇文章为作者亲自走访第二次武装移民入侵地——千振乡，以及采访第二次武装移民团团团长宗光彦后所做。

③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员对组织者在移民事务方面的无计划性、专政以及逃避责任等行为表现出不满，以联名签署请愿书的形式抗议移民团管理者，为自身争取“权益”的运动。

④ 一种发生于日本移民中间的疾病，主要是由于移民无法适应“开拓地”生活，导致出现不良情绪，甚至自杀、逃跑等现象。

⑤ 指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町步约0.99公顷。



步,<sup>[14](P73)</sup>出租率达67%。且不论这一现象已打破了日本殖民者试图实现的“开拓民自立自营从事农业经营”<sup>[7](P4)</sup>的目标,单是从试图培养熟练东北农业的日本移民这一目的而言,也无疑是失败的。甚至连殖民政策倡导者东宫铁男也认为,“总体而言,过去的三年针对第一次武装移民是一段受难的历史,……客观地从与既定计划脱节,收支核算以及牺牲者数量来讲,可以称之为失败。”<sup>[10](P59)</sup>

综上所述,日本“满洲移民”的根本目的在于永久占领东北,第一次武装移民作为这一计划的重要环节,两者自然“一脉相承”,无论是名称、机构设置,还是为便利移民生活而筹建的基础设施都是服务于这一终极目标。此外,日本殖民者以高度功利心,假借各种手段,向国内民众宣扬移居“满洲”的“美好生活”,意图使国内上下一心,举国投身于“满洲移民”事业之中,其行为的殖民目的性远大于民众的自发性。可见,“弥荣村”是日本殖民者精心规划的畸形殖民村落,与其一手炮制的畸形“满洲国”无异,从长远计,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是无法得以延续的。

## 二、援战经济组织

恩格斯曾说:“一切社会的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求之于各时代的经济。”<sup>[15](P279)</sup>正如日本“满洲移民”这一行为,无不与人口移出、入地双方经济环境存在密切联系。作为岛国的日本受自然条件限制,耕地狭小,而与之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北则包藏天然富源,耕地广阔且资源丰富。东北之富,早已成为日本侵略的着眼点,日本企图借移民之力,将东北作为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后方。

### (一) 企图缓解经济压力,转嫁国内危机

日本耕地、资源贫乏现状自不待言,土地、资源限制为客观因素,但因此而大行对外扩张之举,便是主观侵略的表现。据当时的统计,“日本现有国土面积计三千八百十五万四千余公顷,农地为六百〇一万五千公顷,耕地面积,约占其国土面积之十五.五%。”<sup>[16](P127-128)</sup>在耕地面积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造成人均耕地不足的原因只有一个,即人口持续增长。据日本统计,1867年日本总人口为30,000,000人,至1927年已增至63,862,538人。<sup>[16](P130-131)</sup>

在日本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1929—1933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自然难以幸免。工农业遭受重创,工业生产总额从1929年的76亿元骤降至1931年的50亿元,<sup>[6](P17)</sup>外加持续而来的财政赤字和信用体系崩坏,导致大量失业、

半失业人口泛滥,为维持生计,城市人口开始向农村逆转。但农村同样未能幸免,以水稻和蚕茧为代表的农作物价格暴跌,与此同时,以肥料为代表的农业购入品价格上涨,使农业陷入财政赤字境地。

为消解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农林省出台了旨在平衡农家收支,转赤为盈的“农村经济更生计划”,但该计划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反而使富农为节约成本,大量解雇雇农,造成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发生多次主佃斗争。上述矛盾加速了日本企图转移过剩人口的计划,“惟移民一法,不仅可解决日本人口过剩与粮食恐慌,且能发扬国威于海外,自乐为崇尚武士风之日本民族所采取。”<sup>[16](P2)</sup>

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口过剩的危机并不能成为其非法移民中国东北的借口,“满洲移民”计划只是日本在蓄谋推进“大陆政策”的前提下,被日本殖民者顺势赋予了“缓解日本农村危机”的经济动因。

一方面,以1930年日本人口为例,该年日本共有人口6,444万,以6,015,000公顷的耕地面积计算,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4亩,实则并不能导致“土地饥饿”问题出现。究其根本,“日本国内之所以存在着严重的农民土地问题,只是由于日本垄断资本和地主统治的必然结果。”<sup>[17](P99)</sup>日本殖民者之所以大肆散播国内危机,根本是在为“满洲移民”计划寻找合理借口,如此便可缓解国际舆论谴责。

另一方面,从第一次武装移民实际状况来看,日本向东北移殖的人员并非处于饥饿线的农民,而是配有武器弹药、训练有素的退役军人。第一次至第五次武装移民人数基本维持在千人左右,在移居地进行的各项活动都是小规模试验,不符合日本国内人口严重过剩,亟待向他国转移人口之况。

关东军于1932年制定的《日本人移民案要纲》附件说明书中明确指出:“将我邦人移植到满洲来的原因,不仅是为了缓和我国人口过剩的问题,在伸张满蒙帝国权益、开发满蒙、确保帝国国防第一线方面绝对是当务之急。”<sup>[18]</sup>可见,人口危机固然是日本发动“满洲移民”的动因之一,但也只是驱动因素,而日本殖民者长久谋划的对外殖民扩张,试图鲸吞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才是日本移民东北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体现了“满洲移民”计划的真正本质。

### (二) 作为战略后方,支援前线战争

为提高战争实力,日本举国进行增援战争生产,但受资源限制,便蓄谋利用国内人口充当战时劳动力,开发利用中国东北富源,这也是日本发动“满洲移民”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日本所进行的

援战生产包含两大因素：加强重工业发展；扩大粮食产量。前者主要是开发钢铁、煤炭、石油等战略资源，后者则是保证基础物资供应充足，将两者置于相同地位，可知粮食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由日本炮制的伪满州国毫无疑问地被当作“粮仓”，通过获取大量耕地，发展农业经营，就地生产战略物资。

土地为生计之基础，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未建立“弥荣村”之前，便自觉与移居地建立联系，通过与当地官宪签订合同，强占土地45,000町步。<sup>[19](P99)</sup>在入殖“弥荣村”后，移民团更是利用专门培训的适用于“满洲”的农业耕作方法进行土地开垦。初期主要是借助传统畜力，但由于畜力不及机械化效率高，无法满足短期内开垦大量耕地的目标，加之东北抗日武装袭击，农业经营基本采取防御和耕作相结合的方式，延缓了开垦速度。1935年移民团利用从哈尔滨铁道局借贷的两台拖拉机开垦土地150町步。<sup>[20](P148)</sup>同年，日本殖民者设立了以取得、管理、配售移民用地为业的“满洲拓殖会社”，为移民团提供拖拉机11台，开垦土地1,000町步。<sup>[20](P148-149)</sup>据统计，截至1939年，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强占可耕地共计12,000公顷，已耕地2,770公顷。<sup>[1](P132)</sup>

占有一定数量土地后，移民团开始在“弥荣村”实验种植当地作物。据史料记载，移民团所试种作物多达50多种，其中包括为面粉工业、榨油工业、制糖业、酿酒业等部门提供原料的经济作物，以及饲养家畜的饲料作物。“我国农业移民在满洲国发展之时，农民所选作物，饲养物以及经营方法是由我国缺乏物资增产的结果。”<sup>[21](P2)</sup>这意味着移民团的经济行为是由日本国内经济现状所决定的，日本国内所缺物资，只能仰给于“满洲”。

为最大程度上将掠夺资源在当地加工利用，移民团特设置了旨在“建设健全移民农村，发展经济，培养组合成员独立发展”<sup>[10](P207)</sup>的“弥荣村共励组合”，统筹移民团内所有经济事宜。“组合”下设消费部、信用部、承包部、贩卖部、加工部、事业部，各部门间相互协作，构建了一套流水线式的经济运转模式。此外，移民团还挑选出有相关技能者组成农产品加工班、炼瓦班、运材班、木工班及传令班，将所获资源在当地加工利用。这也体现了第一次武装移民作为“特殊移民”的性质。

除耕地资源外，“弥荣村”地靠松花江，渔业资源富庶，其中包括鲤鱼、鲑鱼、鲫鱼在内的各种鱼类约三十多种。且该地大部分为林地，森林资源极为丰富，此外，该地还富藏砂金及建筑所需的花岗岩、石灰岩等资源。第一次武装移民团选址于

此，必然与当地丰富资源存在密切关系。

综上，第一次武装移民团以“弥荣村”为载体进行土地开垦、农作物种植和资源掠夺，其居心不言自明。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具有结构上脆弱性的日本资本主义，为了缓和危机，便转向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因此，提出各种作为对农村、农民的救济政策，不仅限于应付经济危机，而且是作为完成支撑侵略战争而确立农村、农民统治机构为目标的各项政策的一环而出笼的。”<sup>[22](P229)</sup>不能否认日本“满洲移民”计划具有转移国内危机的目的，但在更深层面上依旧是为了服务侵略战争。

### 三、关东军后备组织

无论“满洲移民”承担的是何种角色，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军事战争。日本虽通过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确立了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却也引起了战败方沙俄和被压迫者东北民众的反抗，以“满洲移民”作为非军队人员，充当维持“满洲治安”和对苏防御的后备组织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又一重要举措。且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极具话语权，其控制下的东北军事、政治情况对日本侵略具有重要影响。<sup>[23](P139)</sup>因此关东军主导下的“满洲移民”便毫无疑问成为其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后备组织。

#### (一) 镇压抗日武装，维持“满洲治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欧美各国推行东北亚地缘战略核心的中国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将战略重点集中于此，中国由此成为各国博弈的竞技场，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处于日、俄两国领土之间，地理位置显要，曾被称为“远东的巴尔干”。因此，为保证地缘战略平稳运行，以维护自身利益，欧美各国在地缘战略外，所推行的东亚均势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中、日、俄之间大规模冲突的产生。1904—1905年，凭借日俄战争成果，日本实力骤然提升，与之长期在东亚角逐的俄国遭受重创，东亚均势失衡，在此情况下，欧美列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制约日本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拥有绝对实力的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便与中国东北进行频繁贸易往来，日俄战争中，美国支持日本制衡苏俄，但战后日本却针对美国在东北的权益进行了抵制<sup>①</sup>，使美国认清了日本贪婪的本性。

1931年，日本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非法炮

<sup>①</sup> 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收买“南满铁路”未果的事件。日俄战争后，两国代表在美国朴次茅斯进行谈判时，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前往日本，同日本首相桂太郎签订了合办“南满”铁路的桂哈合约，但在哈里曼抵返美国时，日本废除了这一草约，决定独立经营“南满”铁路。

制“满洲国”，企图独占中国东北，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欧美列强试图在东亚构建的均势格局，事变后，关东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欧美等国的警惕。为维护既得利益，日本最终选择退出国联，选择焦土外交，致使其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立，引发了舆论声讨。“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载：……日本陆军称列强互相齟齬，及无暇他顾之际，巩固其在满洲之地盘，蹂躏凯洛格公约，毁坏九国公约……”<sup>[24](P22)</sup>虽然国联派出查明实际情况的李顿调查团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未从根本上制止日本占领东北的暴行，但国联出于维护话语权的考虑，拒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使日本开始对新生“满洲国”前途知之甚稔，并清楚认识到，“满洲国的前途只有靠日本的实力来拥护和培养。”<sup>[6](P40)</sup>复杂的国际形势刺激了日本扩军备战的进程。

另外，从中国情况来看，关东军以军事武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从根本上激起了东北民众的强烈反抗，为协助关东军监视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分散化解军事力量，日本开始重新将“满洲移民”计划置于议会提案桌上。“第一，组织身心强健的日本在乡军人集团；第二，分散安排至全满，主要是中北满各地，切断匪贼集结通道。”<sup>[6](P42)</sup>日本军部企图通过向中国东北输送大量移民的方式，与关东军相勾结，切断抗日武装与当地百姓的联系，以此束缚抗日武装手脚，消灭活动空间。这便造成九一八事变后的武装移民较初期试点移民而言，除承担一般性农业任务外，兼顾了“维持满洲治安”的角色，更具军事殖民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省公开刊行的《陆军宣传册》对“国防”概念进行了解读，强调在“国防第三阶段”更加凸显人（即移民，笔者注）的要素，而“满洲移民”计划更是将人的要素进行了最大化利用。据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的日本战犯古海忠之供述：“从满洲开拓政策制定的时候起，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sup>[11](P625)</sup>把移民团武装成深入东北农村的村屯组织，平时生产，战时辅助关东军镇压东北民众，监视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便是日本“满洲移民”计划的真实企图。另外，从移民团员招募过程来看，主要是由日本陆军省、关东军、退役军人府县及地方联队区司令部主导，在退役军人中遴选符合要求者进入殖民地。

大规模退役军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在“满”日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据统计，“日本在东北的军部，在必要时已能在东北与高丽内地动员十一万六千的在乡军人与后备军以及二万二千宪警——这个

数目，足以在动员时编制十个日军的师团。而日军为要使在乡军人及后备军容易补充各地日本的驻军，于是便把他们逐渐地分布于各重要的战略地点。”<sup>[25](P181)</sup>这一点从“满洲移民”选择入殖的地域便可证实，“移民团的地点多数选择三江、安东、牡丹江、黑河等重要军事地区的后方，而这些地点都是由关东军决定的。”<sup>[11](P626)</sup>其中，作为第一次武装移民入殖地的“弥荣村”正是位于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桦川县，三江地区是抗日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中共“北满”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大量活跃于佳木斯地区，抗日联军十一个军中，第六、七、八、九、十一军便诞生于此。<sup>[26](P4)</sup>据统计，1935年，伪三江省共有抗日队伍28,862人，一年共外出抗日1,808次，其中第一次武装移民团驻扎的桦川县共有抗日队伍3,418人，仅半年便参加抗日67次。<sup>[27](P586-588)</sup>面对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的反抗，为维持三江地区稳定的“治安”环境，日本特在此安插了带有武装色彩的日本移民。

从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具体行动来看，移民团在尚未真正进入移居地之前，便首先进行了警备上的部署和训练，按照军队编制组成了“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其中设置4个步兵中队，退役军人的经历使其中不乏军事作战所需要的炮兵和步兵炮手，由其组成步兵炮队，装备两门迫击炮，另外选拔出专门的机关枪手，配备步枪和科威特式机关枪，同时率先划定各小队警备区域，以抵御来自当地抗日武装的袭击。

虽然第一次武装移民规模尚小，在一定程度上达不到动摇东北抗日武装根基的作用，但日本移民却以自恃的“民族优越感”对占领区民众恣意欺凌。据曾任侵华日军陆军总司令部经理部金融课长的战犯平井丰一供述：“把日本农民移入中国东北，压迫原来的中国农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体现。”<sup>[11](P635)</sup>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同样承袭了这一“意志”。据参与迫害中国民众的移民证言称：“特别是在弥荣村存在虐杀大量中国人的例子，即1933年8月16日位于永丰镇东南数十里的夹信子虐杀。领导青森、岩手和秋田小队的熊谷伊三郎率领第一中队，将位于抗日游击队据点的夹信子部落全部烧毁，杀害了部落内老幼妇女等20多人。”<sup>[28](P242-243)</sup>1938年4月29日晚，移民团发现饲养的10匹马丢失，便立即派人携枪寻找，最后跟随马匹踪迹将范围锁定在中国农民居住区，为找出马匹，用枪将30多名手无寸铁的当地村民全部刺死。<sup>[28](P243)</sup>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暴行足以证明，所谓移民只不过是戴着“移民”面具的日

本军人。

## （二）抵御苏俄的后备力量

日、俄两国自甲午战争后，因辽东半岛问题结怨已深，经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俄方针由消极防御转为积极应对。关于日俄战后下一步对外扩张的方向，以海军派和陆军派为代表，分别提出了“南进”和“北进”方针。“南进”以台湾为中心，辐射南洋群岛；“北进”以朝鲜、“满蒙”为基础，波及中国全部及苏联远东地区，在最终权衡下，选择了后者。“满铁”创立委员长儿玉源太郎曾言，“日俄战争恐不能以满洲一战了局，第二次战争将于何年再来……要之我们在满洲非常占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步不可。”<sup>[29](P73)</sup>可见，即使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但因两国在东北问题上存在巨大利益冲突，导致日本从未放下对俄戒心。

1936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拟定的《国防国策大纲》中明确提出，“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后由于陆海军意见不一致，在第三次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重新规定了，陆军以苏联为目标，海军以美国为目标的外交策略。<sup>[30](P609-610)</sup>同时，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苏联的威胁，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两国走上了联合抗衡日本的道路，这便在延长日本对华战线的同时，使苏联和中国一道，成为了日本共同的打击对象。

日本在加紧侵华的同时，不断酝酿对苏作战，试图在侵占东北后转战苏联。但从中苏两国在边境的兵力来看，日本共有步兵三个师团，骑兵两个旅团，苏联部署有步兵八九个师，骑兵一个半师，总兵力达十二余万，装备精良，人马充实，配备独立机械化部队，大量战车、飞机。<sup>[6](P41)</sup>和苏联在边境兵力部署相比，日本处于绝对劣势。仅就1931年两国兵力而言，苏联拥有常备兵690,000名，后备兵13,960,000名，日本拥有常备兵259,304名，后备兵7,340,000名。<sup>[31](P98)</sup>苏联兵力是日军的两倍有余，加之在东北战场上，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牵制，造成日本兵力严重不足。

作为应对之策，关东军开始筹谋动员国内民众以“移民”身份为掩护，武装入侵中俄边界。儿玉源太郎曾在“满铁”创立初期便提案，“长久确保满洲之策略，除铁道和移民之外，别无他法，若成功在此地扶植五十万定居日本人，便可构筑起应对中国及自北方而来之侵寇（苏联）之铜墙铁壁。”<sup>[6](P38)</sup>

1932年7月17日，东宫铁男在《在乡军人屯田移民实行案》中明确指出，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必须实行的理由包括“对苏国防”。<sup>[10](P48)</sup>同时

《弥荣村史》一书作为战后日本编撰的记录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关键史料，在刊行序文中更是毫不隐讳表明第一次武装移民团是战时抵御苏联的第二战力。<sup>[10](P2)</sup>另外，就影响第一次武装移民团选址的两大因素——协助关东军维持治安、对苏作战<sup>[10](P361)</sup>来看，同样表明了日本通过移民手段抵御苏联的意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面对苏联威胁，大量部署于“北满”的日本移民充当了抵御苏联的后备军。其中，多位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员在战后回忆中，均提到对苏作战经历。据原田时次郎回忆，“1945年7月，在现地应召加入15255部队，8月8日受苏联军队袭击而交战，在敌战车的猛攻下，我军部队接连败退。”<sup>[10](P181)</sup>立花贞十郎同样在回忆中提到，“1945年8月9日，苏联战机在佳木斯忠灵塔附近投下炮弹，本团接到紧急部署通知。”<sup>[10](P316-317)</sup>除移民团员外，作为“大陆花嫁”的越井静子也曾回忆到“随着大东亚战争不断扩大，男子陆续被召集，丈夫也于1945年7月25在最后的召集下参战。”<sup>[10](P289)</sup>由此可见，以第一次武装移民团为代表的“满洲移民”在日本战败弥留之际，应召迅速投入战备状态，充当了抵御苏俄的后备力量。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日本“满洲移民”计划中扮演了不同角色。实则，所谓“移民”，只不过是较军事侵夺而言，以相对“温和”手段占领他国领土的代名词。借侯厚培先生观点加以论之，“日本在华之侵略政策不出两端，一为政治的侵略，一为经济的侵略。威迫利诱，破坏和平，为政治的侵略，对华投资，掠夺原料，操纵金融机关，开拓市场为经济的侵略。”<sup>①</sup>需明晰的是，在更多情况下，日本殖民者是通过移民方式将多种手段同时施加于中国人民，第一次武装移民便是铁证。通过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弥荣村”的各项活动可见，日本“满洲移民”计划在中国东北所发挥的作用是多重的，既有政治同化、经济掠夺同时还伴随着军事欺压，其行为辐射面较单一破坏和平、掠夺资源、侵占利权等方式，更显复杂和多元。虽然日本“满洲移民”计划形式各异，内容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无论何种手段，最终都是服务于永久占领中国东北这一究极目标。

## [参 考 文 献]

[1] 马伟. 日本“北满移民”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sup>①</sup> 侯厚培, 吴觉农: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 上海: 黎明书局, 1931年, 第5页。



- 版社,2015.
- [2]三井報恩会. 滿洲移住地視察報告[M]. 東京:三井報恩会,1938.
- [3]大藏省. 第1回滿洲農業移民募集要綱[A].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9050272400
- [4]今井良一.「滿洲」農業移民の経営と生活——第一次移民団「弥栄村」を事例として[J]. 土地制度史學,2001.
- [5]陸軍省憲兵司令官秦真次. 佳木斯屯墾隊の近況の件[A].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1933年4月11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C04011566900.
- [6]喜多一雄. 滿洲開拓論[M]. 東京:明文堂,1944.
- [7]宗光彦. 北滿開拓地農業經營論[M]. 東京:滿洲日日新聞社支店,1938.
- [8]孙瑜. “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J]. 抗日战争研究. 2023(2).
- [9]黑龙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黑龙江文史资料第30辑 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10]松下光男. 弥栄村史・滿洲第一次開拓団の記録[M]. 東京:弥栄村史刊行委員会,1986.
- [1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2]拓務省拓務局東亞課. 拓務省滿洲農業移民概況[M]. 東京:拓務省拓務局東亞課,1936.
- [13]山崎芳雄. 弥栄村要覽[M]. 東京:滿洲移住協會,1936.
- [14]滿洲國立開拓研究所. 弥栄村綜合調查[M]. 長春:滿洲國立開拓研究所,1942.
- [15]恩格斯. 反杜林论[M]. 吴黎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16]侯厚培,吴觉农.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M]. 上海:黎明书局,1931
- [17]孔经纬. 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我国东北的侵略活动[J]. 历史研究. 1961.
- [18]関東軍統治部. 日本人移民案要綱説明書[A]. 1932年2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A09050413500.
- [19]滿洲開拓史刊行会. 滿洲開拓史[M]. 東京:滿洲開拓史刊行会,1966.
- [20]渡辺千代江. 弥栄村建設の五年:第一次特別農業移民団經營記録[M]. 東京:滿洲移住協會,1938.
- [21]日本學術振興會. 滿洲農業移民ノ必要性及可能性[M]. 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35.
- [22]滿洲移民史研究会.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M]. 孟宪章,等,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 [23]关靖华,孙瑜. 伪满初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电业权益的争夺——兼论“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成立始末[J]. 北方论丛. 2023(1).
- [24]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印. 各国对日占东北之评论[M]. 杭州: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1931.
- [25]维真. 九一八后东北与日本[M]. 上海:生活书店,1935.
- [26]朱春龙. 东北抗联在三江[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 [27]满史会. 滿洲开发四十年:下卷[M].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译. 营口: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组,1988.
- [28]桑島節郎. 滿洲武装移民[M]. 東京:教育社,1979.
- [29]国新社. 沦陷七周年的东北[M]. 上海:生活书店,1938.
- [30]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M].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1]程旨雲. 东北事变与日本[M]. 上海:大东书局,1931.

## The essence of “Manchukuo Immigration” in Japan from the first armed immigration

QIN Yu – xia, SUN Yu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nchukuo” accelerated the systematic immigration of Japan to Northeast China.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first armed immigration, this group is not only a political colonial organization with villages as the carrier; Is to alleviate the population crisis as a bridge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t was also a backup organization of the Kwantung Army under the pretext of “immigration”. What was exposed was the multiple aggressions of the “Manchurian immigration” project, which included political assimilation, economic plunder and military oppression. In general, “Manchurian immigration” was mor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than other ways of destroying peace, plundering resources, seizing rights and interests. Its essence was always a hidden colonial aggression l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and aimed at permanent occup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Japan; Armed immigrants; “Iyasaka Village”; Colonial aggression

[责任编辑 孙兰瑛]